

CHINA

外國名作家傳

茅盾題 

主編
張英倫 呂同六
錢善行 胡湛珍
高 莽

中國發刊出版社

CHINA

2002
K815.6
53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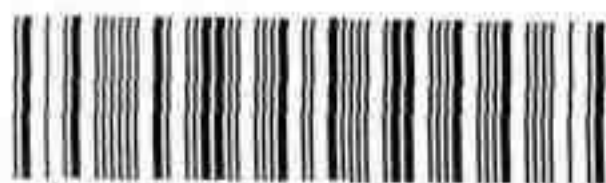
张英伦 吕同六
钱善行 胡湛珍 主编
高 莽(绘图)

外国名作家传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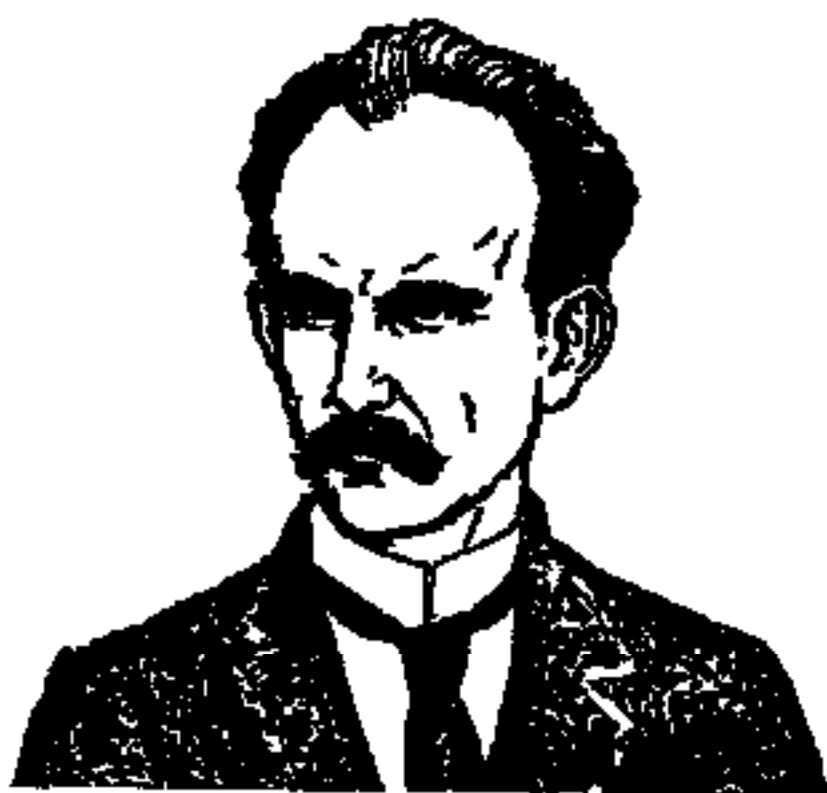
中國發刊出版社



3 0651 8233 3

马 蒂

朱景冬



何 塞·马蒂 (José Martí, 1853—1895), 古巴民族英雄、著名诗人和新闻工作者。

马蒂生于哈瓦那一个贫穷的军人家庭。在中学读书时就热心参加进步政治活动,关心祖国的独立事业。从十六岁起,他就立志把自己贡献给革命和文学事业。一八六九年,马蒂和自己的老师、著名的爱国诗人门迪维创办《自由祖国》周刊,

并在上面发表第一部作品——诗体历史剧《阿布达拉》,宣传为祖国的独立献身的进步思想。第二年,马蒂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关入监狱,判处六年苦役,放逐到皮诺斯岛,不久又转移到西班牙。在西班牙期间,马蒂依靠朋友的帮助,进了马德里中心大学和萨拉戈萨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同时阅读和研究西班牙文学。一八七一年,他发表了一部政论集《古巴的政治监狱》,根据自己在狱中的亲身经历,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迫害古巴爱国志士的罪行。一八七五年,马蒂离开西班牙回到美洲,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住了几年,从事政治宣传活动。一八七八年,古巴第一次独立革命战争结束,历时十年的革命斗争成果被大地主阶级出卖。这时,马蒂回到祖国,为国家的命运深感忧虑,决心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为争取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不久,他的秘密活动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注意,再次被流放到西班牙。一八八一年,马蒂逃到巴黎,同年到了纽约,从此他就一直住在美国,担任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驻美国的领事。马蒂在美国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劳动者的力量和人民的困苦生活,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一八九二年,马蒂在美国纽约创建了

古巴革命党,并任领袖,同时创办了《自由祖国报》,一面大力开展革命宣传,一面积极准备在祖国发动民族解放战争。

马蒂首先是个热烈、坚定、卓越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和作家。马蒂认为,诗歌应该生根于土地之中,以现实的事物为基础,为祖国和革命事业服务。他说:“诗,无论落到什么地方,都应该放射出光辉和芬芳。”他还说:“我们不应该仅仅吟咏个人的痛苦和欢乐,而应该写出对世界有益的诗歌。”马蒂的诗歌创作,正是这种诗歌理论的生动体现。马蒂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主要的都汇集在三部诗集中:《伊斯马埃利奥》、《自由的诗》和《纯朴的诗》。这些诗歌,充满了真挚的感情、青春的活力、美好的向往,表现了诗人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

马蒂一登上诗坛,就表明自己是古巴诗歌的大胆革新者。他的第一本诗集《伊斯马埃利奥》(1882)打破了长期统治拉丁美洲文坛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借用某些现代主义的手法,表现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这部被称为是“对年幼儿子的父爱颂”的诗集,是诗人在流亡国外时因为怀念他的唯一的儿子而写的。当时,作者远离祖国,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他常常做梦,梦见大海和荒野,梦见幼子跨着一头雄狮;他常常回忆,想起了儿子的娇嫩芳香的小手,两只可爱的小脚,以及儿子的微笑和叫喊,等等。整个诗集以丰富、豪放的想象,清新、美丽的意境,和真挚、纯朴的感情,通过对儿子的深切思念,反映出诗人对殖民统治下的祖国命运的忧虑不安和对后代的美好未来的憧憬。在这部诗集中,作者表现出自己既是一个才思横溢的抒情诗人、感情深挚炽烈的父亲,又是一个热忱、坚毅和忠心的爱国志士。

第二本诗集《自由的诗》,大部分写于八十年代,即在诗人艰苦从事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作者在这部诗集的序言中说:“这些诗,是我内心的创伤,是我的战友。……它们像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珠,象伤口里流出的鲜血。”这些诗,表面上仿佛是一些无边无际的想象,但它们和当时流行的一般浪漫主义作品不同;诗人通过奔放的想象和奇丽的诗句,抒发出自己胸中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对蹂躏祖国的殖民者进行猛烈抨击;它是诗人投向敌人的锐利匕首,同时充满对独立自由的必胜信心,象熊熊燃烧的火炬,号召人们去斗争。

《纯朴的诗》(1891),是马蒂旅居美国时的诗歌创作汇集。诗集反映了诗人这个时期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艺术特色。当时,由美国操纵的美洲国家会议正在开会,美帝国主义称霸美洲的野心业已暴露。但是有些古巴人对此认识不清,为了赶走西班牙殖民者,竟企图引狼入室。这使马蒂极为担心。他深切感到美帝国主义者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危险敌人。就在这样的心情下,马蒂写下了收在《纯朴的诗》中的大部分诗篇。这是一部独特的诗体日记,它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表现出抒情主人公——诗人马蒂的深刻、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和真诚、朴素而坦荡的思想感情。这个诗集在艺术上,想象的成

分减少了,代之以更多的现实描写,语言和诗句也更质朴自然了。

马蒂的著作极其丰富,其中有小说、剧本,还有大量的政论,当然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诗歌。除了诗歌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马蒂写的大量政论。例如,在一八七三年出版的《西班牙共和国和古巴革命》一书中,马蒂热烈宣传民族独立思想,号召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在《北美实况录》(1881—1891)一书中,他根据亲身见闻,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种种黑暗腐败做了揭露,号召拉丁美洲人民警惕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

一八九三年初,由于马蒂领导的革命党人长期多方面的积极准备工作,古巴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同年四月,马蒂从美国秘密回到古巴,同国内其他革命领导人一起发动武装起义,同西班牙殖民军进行浴血战斗。五月十九日,马蒂正在奥连特省多斯·里奥斯营地,突然遭到西班牙占领军的袭击。他和士兵们一起向敌人发起冲锋企图突围时,不幸牺牲,年仅四十二岁。

作家必须拥有非凡的观察力

莫泊桑在谈到作家应该细致、敏锐地观察事物时,这样说道:

“必须详细地观察你想要表达的一切东西,时间要长,而且要全神贯注,才能从其中发现迄今还没有人看到与说过的那个方面。

为了描写烧得很旺的火或平地上的一棵树,我们就需要站在这堆火或这棵树的前面,一直到我们觉得它们不再跟别的火焰和别的树木一样为止。”

据俄国作家库普林说,契诃夫拥有非凡的观察力。一个人,只要他见过一次,这人的特征他就永远不会忘掉;契诃夫能够一下子抓住整个人的内在的本质,并善于用寥寥数笔勾画出他的轮廓。

马丁·杜伽尔

谭立德



罗

歌·马丁·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 1881—1958), 法国现代小说家。他年轻时,在巴黎国立宪章学院求学,造就了循规蹈矩和善于分析的个性。毕业后,他当上了古文学文库管理员,这一职位为他从事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九〇九年以后的数年内,他曾发表过几篇不甚成熟的作品,但在第一部小说《成名》中,他已开始运用简洁、精炼且十分优美的语言来描绘两位初出茅庐的作家的不同结局。其中一个天资聪颖,但却

因只强调灵感而告失败;另一个虽说天赋不及前者,但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别人的优秀写作技巧,终于一举成名。作品反映了马丁·杜伽尔本人求实的创作观念。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六年,法国发生了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德雷福斯事件。马丁·杜伽尔密切注视这一事件,仔细观察了它在人们思想意识中所引起的混乱,尤其深刻地研究了法国青年在二十世纪初叶的精神状态,从而在一九一三年发表了小说《让·巴洛瓦》。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酷爱科学与进步的新闻记者。这位记者为自己的理想而生存、奋斗,但又常常感到困惑、苦恼,终因病老交加而皈依宗教。这是一部论文性作品,但作者不加个人评论,只是把一些场面、叙述、对话、书信甚至真实资料组合在一起,巧妙地阐述了作者的论点。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马丁·杜伽尔的写作技巧已趋成熟,但人物的对话却仍显得矫揉造作。后来,马丁·杜伽尔一度热衷于戏剧,先后发表过《勒娄神父的遗嘱》、《膨胀》、《沉默的人》、《古老的法国》、《非洲秘闻》等剧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丁·杜伽尔应征入伍。战后,他根据在战争期间

所观察到的社会政治状况进行构思,于一九二二年着手撰写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蒂波一家》。在《蒂波一家》中,马丁·杜伽尔通过描绘蒂波父子、兄弟间的冲突,并且穿插刻画了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封达南一家,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战争。

蒂波家两个儿子安东纳和雅克,因不堪忍受虚荣、自私而又专横的父亲,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先后逃离家庭。安东纳专攻医学,随波逐流,成为一个行医行善、冷漠、稳健的人。雅克颠沛数年后,定居瑞士,加入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工人共产国际,幻想建立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基地。因父亲病重,安东纳回到老家,偶然发现雅克踪影,便到洛桑寻找。弟兄两人赶回巴黎时,老蒂波已不久人世。父亲死后,两人对行将爆发的战争各执己见,不欢而散,各奔前程。这时雅克与幼年好友达尼拉的妹妹珍妮·封达南邂逅相遇,他们旧情复燃,倾心结合。大战危机日益加剧,雅克奔波于欧洲各国,力图说服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反对战争。在总动员前夕,工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被谋杀,致使该组织解体。但雅克并不甘休。大战爆发后,他起草了一份反战传单,亲自乘飞机到前线散发,不幸被击身亡。一九一八年,大战已接近尾声时,安东纳在战火中已成残废,他与封达南一家相遇,看到雅克的遗腹子让·保尔,百感交集,深悔自己没有听从雅克劝告,但是残疾已使他无能为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他开始撰写日记,记载自己一生所得的教训,作为遗嘱,忠告后人。

马丁·杜伽尔深受列夫·托尔斯泰、左拉、果戈里等作家的影响,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他认为“形式与内容好比佐料与兔子那样是两回事”,如果仅有华丽的形式而内容空乏,决不能构成好作品。相反,如果内容充实、真切,即使形式平庸些,作品仍具有吸引力。因此,在写作《蒂波一家》时,他抛弃了《让·巴洛瓦》中那种浮夸、华丽的对话,而采用了朴实无华的笔风,语言简洁明快,对人物心理刻画尤其深刻、细腻,整部小说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其中第四卷《诊断》和第六卷《父之死》都是描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选材得体,文字含蓄并且运用了特写手法,十分引人入胜。

马丁·杜伽尔花了整整十八年时间,呕尽心血,写成这部八卷巨著。小说发表后,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成为继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于勒·罗曼的《善意的人们》之后一部最为风行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马丁·杜伽尔“因为他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所描绘的人的冲突及当代生活中某些基本方面的艺术力量和真实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马尔洛

张英伦



安

德列·马尔洛 (André Malraux, 1901—1976) 是著名的法国小说家、考古学家、艺术理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反法西斯战士、戴高乐政府中的内阁部长, 无论在现代法国文坛还是政界, 都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马尔洛生在巴黎。四岁时, 父母离婚, 他随母亲投靠开杂货铺的外祖母。他中学没毕业就独立谋生, 从事出版业, 二十岁写出第一本诗体小说《纸月》。一九二三年,

他去柬埔寨探险, 在吴哥窟附近的丛林里发现一批古代雕塑, 正待运回法国时被殖民当局逮捕, 投入西贡监狱。狱中生活使他体察到殖民地人民身受迫害的痛苦, 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出狱后, 他兴办《印度支那报》, 谴责殖民主义的高压政策, 主张建立法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文化共同体”。可是殖民当局连这种温和的主张也不容忍, 这报纸只存在两个月就被查禁。一九二五年八月, 他为购买字模前往香港, 那时省港大罢工尚未结束, 中国革命的高潮给了他很大鼓舞。回西贡后他出版了更为激进的小报《枷锁中的印度支那》, 同时他参与发起了“青年安南”运动, 据说他还在西贡华人聚居的堤岸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枷锁中的印度支那》报由于财政拮据也没有维持多久。不久, 马尔洛抱着“唤起民众, 支援印支人民争取自由”的愿望返回法国。

回国后, 马尔洛重操出版业, 并且勤奋地写作,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先后发表了三部以亚洲为背景的小说:《战胜者》、《王家大道》和《人类的命运》。

《王家大道》(1930) 按其发表年代来说是三部中的第二部, 就思想内容而

言,却是马尔洛思想转折前构思的产物。主人公探险家培肯沿着旧时的王家大道,在柬埔寨古老丛林里探察庙宇。他深为“人终有一死”所苦恼,为了证实自身的存在,他需要斗争、创造或者破坏,肉欲的恋爱也成了他“自我探求”的一种手段。

《战胜者》(1928)在一九二五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的壮阔背景上,着力刻画了置身于革命营垒的几个人物。瑞士人加林主持改组后的国民党宣传部,他与《王家大道》中的培肯同属于冒险家的类型,他探求自我的价值,视“行动”为一切。但他搞的是政治冒险,把个人的探求与集体的运动联系起来。俄国人鲍罗廷是职业革命家,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一切。工人领袖、年轻的中国人洪,实际上是个恐怖主义者。这部名为《战胜者》的小说,虽然同情革命,但并没有塑造出省港罢工斗争的胜利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

《人类的命运》(1933)是马尔洛的“亚洲系”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这部小说以一九二七年三月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策划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这段历史为背景。不过正如小说题名所表明的,马尔洛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不是反映这段历史,而是通过几个主要正面人物在武装起义和随后而来的反革命屠杀中的经历,探讨“人类的命运”。

这几个正面主人公同《战胜者》中的情况雷同,除了一个姓陈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外,都是在华的外国人:清是混血儿,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加托夫是俄国人;海默里希是德国人。小说一开始,写他们这个工人战斗小组为准备武装起义而设法获得枪支。陈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他身上寻到预定要交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的合同。加托夫率领同志们去海轮上截获了这批武器。在起义爆发后的战斗中,陈率领一组工人纠察队,发挥大智大勇,经过激烈交战,攻克政府军一个据点。但在起义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国内外反动势力也加紧了阴谋勾结,在上海的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要求蒋介石镇压上海起义工人,并答应给以资助。于是蒋介石进驻上海,勒令起义者交出武器。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一味妥协退让。清和陈忍无可忍,前往武汉找第三国际代表团,反对交出工人武装。共产国际代表沃洛金声称当前力量对比有利于蒋介石,要尽可能推迟分裂,以便争取时间。清和陈不同意这种说法。清决定抵制这个错误的指示,回去抗击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挽救革命。陈则誓死暗杀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回上海后,陈抱着炸弹冲向蒋介石汽车,可是蒋并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久,清和加托夫相继被捕。清面对敌人的刑讯和诱降,坚强不屈,最后服毒自杀。加托夫被敌人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炉膛里。清的妻子迈得知清牺牲的消息,挺身而出继承清的未竟事业。

马尔洛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家和他们领导的中国人民,他所

刻意描写的只是几个外侨和个别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身在革命队伍之中,却与革命大众若即若离,充满孤独感;他们勇于牺牲,但这并非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而是为了通过死来自我肯定。不过尽管如此,小说《人类的命运》依然有它不可抹煞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从小说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事业深表同情,他歌颂气壮山河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对蒋介石血腥镇压这次起义的反革命行径表示愤慨,他无情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四·一二”事变幕后所起的罪恶作用,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有所针砭。这部小说不失为西方作家反映中国革命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人类的命运》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反响,同年获得法国最有声望的文学奖——龚古尔奖。法国文学批评界公认它是一部杰作。马尔洛也因此一跃而为法国文学的“二十世纪经典作家”之一。

希特勒在德国一掌权,马尔洛就投入了反法西斯运动。一九三四年,他出任世界争取释放台尔曼和季米特洛夫委员会主席,参与建立全国反对反犹太主义同盟,他还访问了苏联。在积极而又频繁的政治活动中,马尔洛的政治思想也演进到新的高峰。一九三五年,他写了中篇小说《轻蔑的时代》,讴歌德国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统治下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监狱里表现出的团结友爱精神。在这篇小说中,他第一次明确表示赞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马尔洛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作为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去马德里实地调查;他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募捐,组织起一支国际志愿空军中队,并亲自担任队长;他数十次驾机执行轰炸任务,两次负伤。与此同时,他并未中断写作。一九三七年,他的“欧洲系”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希望》问世。

与《战胜者》、《人类的命运》所采用的欧洲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手法相比,《希望》的小说技法有了显著变化。它再现了西班牙内战的一些情节,但线索是断断续续的,由大量简短的场面和对话组成,读者看到的与其说是故事的进展,不如说是广泛的思考。小说探讨了革命行动中的理想与现实、目的和手段、友情和纪律等一系列问题。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共和派领导人怎样从温情主义转为讲求实际、从富有诗意的幻想转到你死我活的决战。主人公曼努埃尔就是这种转变的体现者,他原是宽厚仁爱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坚毅无情的战斗指挥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马尔洛参加了坦克部队。一九四〇年六月,他受伤被俘,五个月后逃出战俘营,到达自由区。他蛰居在豪华的别墅里,认为局势已无可挽回,心灰意冷。半自传体小说《与天使的斗争》的灰色调子充分流露了他这一段时间的消沉情绪。这部著作只有第一部分(《阿尔腾堡的胡桃树》)于一九四三年在瑞士出版,其余部分都被马尔洛焚毁。

一九四三年夏天,马尔洛恢复了昔日的斗争活力,潜入敌占区,化名伯格上校,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成为抗德游击战中一个神奇人物。第二年七月,他受伤再次被捕,不久就被盟军解救。他又创立阿尔萨斯—洛林独立旅,参加了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马尔洛思想旅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不理解一九三九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行动和苏联国内肃反“过火”的现象,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幻灭,从一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转变为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兰西国家主义的信仰者。在战后的法国政治舞台上,他与戴高乐形影相随,曾两度出任戴高乐政府的部长职务。他是戴高乐对海外殖民地采取现实政策的重要支持者,他因此曾被坚持殖民主义政策的反动组织“秘密军队组织”列为重点暗杀对象。中法建交后,他曾于一九六五年代表法国政府访问中国,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交部长。一九六九年戴高乐引退,马尔洛也最终离开政坛,专事写作,直到一九七六年病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年代里,马尔洛不再从事小说体裁的创作,而集中精力于研究艺术哲学和撰写回忆录。主要著作有《艺术心理学》三卷(1948—1950)、《想象中的世界雕刻博物馆》三卷(1953—1955)、《诸神的变异》(1957),以及记载了一九六五年访华之行的《反回忆录》(1967)、记述与戴高乐的最后会晤的《被砍伐的橡树》(1971)。

马尔兹

郑土生



艾

伯特·马尔兹(Albert Maltz, 1908—1985),当代美国作家。父亲原是立陶宛人,少年赴美谋生,历尽艰辛,中年成为有名的建筑师,后因中铅毒而去世。母亲是波兰人,幼年被带到美国,成人后做了缝纫工人。青少年时代的马尔兹由于受到父母的良好教育,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同情。他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专攻哲学;在热爱马列主义的哲学老师的帮助下,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九三〇年,他从哥伦比

亚大学毕业后又去耶鲁大学学了三年戏剧。在此期间,他和同学乔治·斯克拉尔合写了剧本《旋转木马》(1932)和《和平降临大地》(1933)。前者讽刺美国政府机关的腐败,后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两个剧本的上演,引起观众的兴趣和批评界的重视,使年轻的马尔兹开始在文学界、特别是戏剧界获得了声誉。

离开耶鲁后,他以罕见的精力,积极从事多种社会活动;既当教员,又当编辑,还兼任好几个进步社团的领导工作,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他常到矿山、农场、汽车工厂去访问,并且亲自参加劳动,有时还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其中一些演说后来收在他的论文集《公民作家》里。他在百忙中,抓紧时间创作了《黑矿》(1935)等四个剧本和《世上最幸福的人》等近十个短篇小说。《黑矿》写一个煤矿工人因领导罢工而被监禁三年,出狱后做了工贼,被工友们唾弃。此剧立场鲜明、感情强烈、语言洗炼,被称为美国“无产阶级戏剧从来没有过的最重要的作品”。《世上最幸福的人》描写一个失业工人为了养家糊口,铤而走险,得了一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职业,却认为自己是“世上最

幸福的人”。这篇小说因其立意新颖,讽刺辛辣而获得欧·亨利奖金。

四十年代,马尔兹一直住在洛杉矶,从事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的创作。在这十年中,他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三部电影剧本,尤以长篇小说成就最大。

第一部长篇小说《潜流》(1940)以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为背景,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三十年代美国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进步工会所作的英勇斗争,热情地歌颂了站在斗争最前线的以普林塞为代表的美国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揭露了美国法西斯组织黑色军团的罪恶活动。

《十字奖章与火箭》(1944)描写一个名叫威利·卫格勒尔的德国工人,在法西斯统治下糊涂地过了多年,可是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睁开眼睛;他不顾生命危险,点燃了一支火箭,向英国飞机指示目标,使英国飞机炸毁了他所在的坦克工厂。由于这本书对暴露法西斯的罪恶和鼓励美国士兵从事反法西斯战争很有帮助,罗斯福政府曾为美国海外士兵印了一种十四万册的特别版。这部小说对各国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鼓舞作用。

《赛蒙·马其维尔游记》(1949)描写一个住在疗养院的退休老工人为医治脚病而出逃后的种种离奇经历,淋漓尽致地讽刺、抨击了社会上各种弊病。

这几部长篇小说使马尔兹被公认为美国无产阶级优秀作家之一,并担任了美国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作协西部分会主席等职务。四十年代末,他在“好莱坞十人案”中受到迫害。一九五〇年,他被捕入狱。翌年出狱,被迫移居墨西哥,过着流亡生活。即使处在这样的不幸中,他还创作了揭露美国“忠诚审讯”罪恶内幕的独幕剧《莫里生案件》(1952)和长篇小说《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1956)。

《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通过描写一个美国监狱中一群犯人在一天里的生活,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美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画。从这幅图画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善良无辜的劳动人民成为现存制度的牺牲品。他们当中有些是受陷害的,有的虽然犯了某种罪行,但是使他们犯罪的却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弗洛依德·瓦尔尼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瓦尔尼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十岁就开始自谋生计,受尽苦难。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参加海军,奋勇杀敌,九死一生,复员后当了一名工人。他在一次自卫性搏斗中,赤手空拳打死了一个持刀行凶的工厂主。因此他被判二十五年徒刑,最后自杀于牢房。

马尔兹的作品构思新奇,寓意深长,语言简洁而精确,情节紧凑而富有戏剧性。他不仅常常把主人公放在生命最危急的关头,放在精神力量极度紧张的时刻去表现,而且善于分析人物的内心活动。

马尔兹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把新中国称为“新的巨人”。他说:“中国人民的成就在美国进步人士的心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我们以特殊的感情来欢迎中国人民的胜利,来欢迎中国人民的辉煌的社会进步”。正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诚挚的友情,马尔兹把《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的原稿寄给中国

作家萧三,使其得以在我国出版,为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作出了贡献。

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一般都认为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所著。但从二十年代末直到现在,对此并非一致公认。

二十年代末小说第一、二部出版时,苏联曾有人提出它是肖洛霍夫抄袭另一作者的一部书,该书也叫《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在一九三〇年的一封信中承认他知道那本书。不过,另一作者的《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关于一九一七年顿河地区的旅行札记;而旅行札记和创作小说毕竟是两码事。

一九七四年流亡国外的苏联人在巴黎出版一本书,题为《〈顿河〉急流》,副标题是《一部长篇小说之谜》。该书前言和正文都提出小说有剽窃之嫌。根据是:第一,肖洛霍夫当时才二十多岁,学历不高,经历不广;第二,全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很不平衡”。作者认为,《静静的顿河》中“真正有艺术价值的”部分是抄袭一个当时混迹于白党的作家,而小说中纯粹出于政治宣传的概念化的东西才是肖洛霍夫的。但这种指责也未免根据不足:第一,一个学历浅、经历不广的青年作者写出概括比较广泛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不平衡的大型作品的,在文学史上例子不少;第二,那个曾一度陷入白党的作家叫克留柯夫在一九二〇年已病死,而小说的内容却一直包括到一九二二年的事件。

马拉美

张英伦



斯

特凡·马拉美 (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对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 马拉美不满那种社会现实, 他在政治上是个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者, 正如他以颓废派的名义公开宣称的“我们今天可以是教徒, 明天可以是怀疑论者, 后天可以是保王党或革命者, 如果我们要这样的话。”不过他从未像魏尔伦和兰波那样激进, 也从未接近和同情

过革命。

马拉美生于职员家庭。他四岁丧母, 父亲再婚, 从此他和妹妹便由外祖父抚养。家庭的不幸成了他受人讥嘲的话柄, 他唯有在读书中寻求安慰。他喜爱波特莱尔、雨果等人的作品。他对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诗感受尤深。为了读爱伦·坡的原著, 他学会了英文。中学时代他写了上百个练习簿的诗歌。他十五岁时, 妹妹死去。他更觉孤寂, 性格更忧郁; 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颇有影响。

中学毕业后, 马拉美遵从家庭的意愿暂时当了职员, 但不久就改做教师。他起初参加巴那斯派诗歌运动, 并在《现代巴那斯》诗集中发表作品, 不过他一八六二年发表的第一批诗作, 如《太空》、《回春》、《恶运》、《苦恼》等, 更多的是波特莱尔诗歌的烙印。他从波特莱尔学会认识人生的痛苦, 他学波特莱尔追求复杂的病态感觉, 他像波特莱尔那样歌咏空虚、死亡和荒诞。波特莱尔诗中对翱翔太空的渴望, 在马拉美的诗中表现得更加强烈: 始终萦回在他脑海的太

空,在他看来是唯一纯洁的地方,可以寄托他的遐思,存放他的理想。在诗的艺术技巧上,他擅长“类推”法:许许多多形象不是按情理排列起来,而是用一个形象唤起和暗示另一个形象。“肉体是悲惨的,唉!我读过所有的书”,《海风》开头的这句诗,是人们经常引用的马拉美类推法的实例。

一八六二年,马拉美认识了少女玛利亚·瑞拉尔;为了进修英文,他携玛利亚前往伦敦;八月,二人结婚。结婚“仅仅是为了她”,因为马拉美这时看法已定:幸福不在世上,只在梦中。他在这年九月发表于《艺术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阐述道:只有梦幻能达到不属于人世的美;梦像太空,是未被行动玷污的地方,是可以逃避人世的地方。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他通过一系列文章建立起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乱弹集》(1897)。马拉美认为梦境是诗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他主张诗歌大力表现梦幻,从而创造出人世所没有的“纯粹的美”。他认为美是神圣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神秘的,因此表现美的诗歌也应是神秘的。他主张诗歌不要叫人理解,它只触人心弦、引人共鸣、供人推测。为了作神秘的诗,只能用暗示,不能指明对象,他说:“指明对象,就是把诗给我们的满足减少了四分之三。”而暗示的主要手段就在于大量使用象征。他甚至主张故意割断诗文的内在逻辑联系,以至规定“必须始终坚持把写出的东西首尾切断,以便让人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他鄙视为“群氓”所欢迎的民主诗歌,因为这种诗歌只会宣传“道德”。

从伦敦归来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〇年,马拉美先后在外省的三所中学任英文教员,执教之余仍沉湎于诗歌。起初两年他痛感自己的无能,因为他写不出自己所苛求的诗歌。《海洛狄亚德》的创作似乎使他渡过了这危机。他在一八六九年的《现代巴那斯》诗集中发表了这部作品的第一个片断,后来又陆续写出几个片断,但至死也没有把这部诗体悲剧写完。已经成稿的部分最重要的是海洛狄亚德和她的老保姆对话的一段。贞洁而又美貌的公主海洛狄亚德企图摆脱人性,她生活在孤独和冷漠之中,奉行禁欲主义,竭力达到永无止境的纯洁性;她只喜欢一面镜子,因为这镜子反映出的她的形象是一个遥远的影子,纯洁而又不可企及。保姆千方百计用人世的欢乐诱导她,吻她的手,给她熏头发的香料,夸奖她的美,都被她一一驳回。保姆走开后,她承认自己在绝望的孤独中所期待的仅仅是个未知的事物。但她最后还是拒绝了保姆的感化。马拉美声称:在《海洛狄亚德》中,“我死了”;也就是说,他取消了任何诗人个人的抒情成分。他这次创作尝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诗歌不再是一个人所受折磨的见证或流露,而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体验。

一八七〇年马拉美回到巴黎,在一家图书馆任职,一八七一年又重执教鞭。公社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巴黎,但这一伟大事件竟未在他生活中激起涟漪,也未在他诗歌中留下痕迹。他依然是只参加文学圈子的活动,同社会的最积极的联系也就是编几份供妇女和中学生阅读的报刊。他收入有所增加,在罗

马街购置了一处住宅,生活更为安逸了。一八七六年,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牧神的午后》问世。这是一首由一百一十行传统的“亚历山大体”(十二音节)诗句组成的诗篇。一个炎夏的午后,在西西里岛的海岸边,牧神感到在近岸的芦苇丛中沐浴、嬉戏的水中仙女的玫瑰色的肉体在闪闪浮动。他的窥视惊动了这群仙女,她们像被他的目光射伤了似的,惊慌地消逝在水中。但岸上一对互相拥抱的仙女依然留在那里,引起他的爱慕。他上前去搂住她们,要亲吻她们的美丽的头发,由于兴奋而变得无力的胳膊放松了,仙女们在转瞬间逃逸。牧神不知道自己是在幻境还是在现实中。他吹起芦笛抒发他的欢乐,也表达他的迷惘。他似乎又进入梦乡,那美丽的仙女重新出现……全诗弥漫着一层奇妙的氛围,创造出似真非真、似梦非梦的境界。以往的法国诗人,还从没有谁做过这样的尝试。由于这首别开蹊径的诗,马拉美常被世人称为“梦幻诗人”。可以看出,诗人对自己关于达到美的途径的观点作了重新的考虑,他不得不承认,理想的美不仅在虚无中。与《海洛狄亚德》相比,《牧神的午后》别是一种思想境界。在这里,难以满足的欲望代替了被否定的欲望,热烈的情景代替了冰冷的形象,生的乐趣代替了苦行,明确的追求代替了无目的的期待。在诗的技巧上,马拉美的类推法在这里发挥到顶点:受类推法的制动,形象好似一个接一个地从阴影中涌现出来,给人以源源不绝、层出不穷的新的意象。这首被推为象征主义杰作的诗篇,对法国和整个西方的象征主义乃至印象主义诗歌都有不小的影响。后期倾向印象主义的法国音乐家德彪西,曾根据它作出著名的同名交响曲。

马拉美的诗风吸引来新一代诗人的浓厚兴趣。约从一八八〇年开始,一批文人经常出入他在罗马街的住所;每星期二晚上更是座无虚席。这就是八十年代人们引为趣事的“马拉美的星期二”。集会者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学名家,例如儒勒·拉弗格、保尔·克洛代尔、保尔·瓦雷里。他们聚会时最经常的节目是表演类推法的技巧,常常把一个很简单的题目类推到想入非非的地步。对马拉美诗作的欣赏玩味也是一个重要内容,马拉美诗歌中充满直觉、推想、暗示的象征天地,每每使他们神往。马拉美的诗歌观念就这样逐渐渗透到新一代诗人中去,促进了象征主义运动的发展。嗣后,他一直教书,直到一八九四年退休。八十年代后期,他汇集过去的诗作,出版了《诗集》(1887);此外,还从事文学翻译,翻译了爱伦·坡的诗歌等。他于一八九八年九月去世。他晚年最重要的诗作是逝世前几个月发表的《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

《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是马拉美诗歌实验的顶点。他对“绝对纯洁”、“脱净了一切现实杂质”的美的追求,最后归结到“字”上来。他认为字既能产生梦幻又能提供美。不过他概念中的字本身就是美,而且仅仅是美,没有任何含意。马拉美“创作”这部作品的方式真是奇特之极:他让字和纸搏斗,尽量减少字所占的空间,扩大纸的空白。据他说,留在纸面上的字都是抵挡住纸